

论无因管理中管理人遭受损害的救济

冯德淦*

内容提要：无因管理中管理人遭受损害的救济模式，解释论上存在着借助于必要费用统合自愿性支出费用和非自愿性遭受损害的一元模式，也有区分两者进行规制的二元模式。我国早期实证法不恰当地采用了杂糅模式，分别就一般无因管理和特殊无因管理进行构造，针对管理人遭受的损害，前者适用损害赔偿原理，后者则架构在公平责任之上，反而带来了价值上的错位。《民法典》为了调和前述矛盾，统一了一般无因管理和特殊无因管理，却不恰当地采用了二元模式，将遭受损害的救济架构在公平责任之上。虽然必要费用和损害赔偿不具有同一性，但是只要与执行事务高度相关的合理利益减少，实证法都需要对此予以救济。就损害赔偿额较高时的控制，应当采用内外部协作的方法，借助于事务固有风险和损害额酌减制度来完善。对于紧急救助行为之下救助人所遭受损害的救济，可以放宽赔偿标准，引入公平责任予以完善。

关键词：无因管理 遭受损害 必要费用 公平责任 适当补偿

一、问题的提出

无因管理中管理人遭受损害时应如何救济？自《民法通则》以来的规范性文件对此均有所涉及，但并无定论；司法实践对此亦无统一立场。早期无因管理的规定，直接借助于必要费用—统自愿性支出的费用和非自愿性遭受的损害，但是针对特殊无因管理也即见义勇为行为，却采用了二分法的构造，即自愿性支出的费用全部赔偿，而非自愿性遭受的损害适当补偿。针对费用的支出，原则上并不设置任何限额，但是就管理人遭受损害，尤其是在见义勇为案型中，司法解释却引入了本人受益范围作为限制，其中的合理性颇值怀疑。

特殊无因管理中费用和损害二元规制的方法，在《民法典》制定讨论阶段，被推广至整个无

* 冯德淦，华东师范大学法学院讲师。

因管理之中。《民法典》第979条第1款针对管理人遭受损害的救济采纳了适当补偿的做法,与必要费用的完全赔偿有所区别。在我国既有责任体系下,适当补偿一般被归为公平责任,其基本意蕴在于本来无需进行赔偿,但是出于公平考量予以补偿。该种从无到有的思维路径必然会降低对管理人的救济。除此之外,适当补偿在我国司法实践中一直存在较大弹性,具体操作中如何控制确实是未来解释的难题。为了厘清管理人遭受损害的救济,下文将从立法和裁判的嬗变出发,在既有立法史和比较法的基础上反思解释论的可能路径,并最终为我国无因管理中管理人遭受损害的救济,寻求解释论上的合理出路。

二、立法和裁判的嬗变

(一) 规范性文件的沿革

自《民法通则》实施以来,我国针对无因管理中管理人遭受损害的救济就一直存在争论。其中《民法通则》第93条明确规定管理人有权要求受益人偿付因为管理而支付的必要费用,但是该条并没有直接涉及管理人遭受损害救济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下称《民通意见》)第132条则指出,《民法通则》第93条中所规定的必要费用,包括在管理或者服务活动中直接支出的费用,以及在该活动中受到的实际损失。主流学说也认为,《民通意见》第132条中的实际损失包括损害赔偿。因而从上述规定来看,在《民法通则》时代,就管理人遭受损害的救济,似乎采取的是肯定的态度,只是在类型上稍加限定。^[1]不过较为有趣的是,针对特殊无因管理之见义勇为行为,《民法通则》第109条却有别于一般无因管理的规定,在侵权法救济模式之下,认为救助人仅可以主张适当补偿,《民通意见》第142条则对此予以了进一步明确,认为救助人可以根据受益人受益多少和经济状况获得适当补偿。在上述损害限制的基础上,就见义勇为过程中遭受的人身损害,《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2003)[下称《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2003)]予以额外限定,其第15条规定适当补偿应当以受益人受益的范围为限额。

从上面的梳理来看,在《民法通则》时代,我国规范性文件区分一般无因管理和特殊无因管理,分别确立了管理人遭受损害的救济。具体而言,在一般无因管理中肯定了管理人遭受损害的完全赔偿原则,而在特殊无因管理中则只确立了管理人遭受损害的适当补偿原则。主流解释论认为,适当补偿和完全赔偿各自都有自己的适用范围,但是这种解释带来的问题是,特殊无因管理中管理人的保护反而低于一般无因管理,尤其在特殊无因管理的见义勇为案型中,上述立法安排则显得极不恰当。^[2]《侵权责任法》并没有改变上述格局,虽然第23条并没有继续受制于《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2003)中所设定的以受益范围为限额的限制,但是其仍然坚持了适当补偿原则。此外,从体系的安排来看,与该条紧密相邻的即为我国侵权法上著名的公平责任条款,

[1] 参见崔建远、韩世远、于敏:《债法》,清华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24页。

[2] 有学者认为该种立法安排“反倒会使见义勇为行为人得不到充分赔偿,从而造成背离实质正义的尴尬结局”。高圣平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立法争点、立法例及经典案例》,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99页。

这似乎更加明晰了责任类型，一定程度上也决定了司法实践中对管理人遭受损害的救济力度。^{〔3〕}《民法总则》第121条规定了一般无因管理中管理人的必要费用偿还请求权，在解释上通常认为，该条延续了《民法通则》第93条的解释，涵盖了损害的救济，仍然肯定了管理人遭受损害的完全赔偿原则。而《民法总则》第183条在特殊无因管理（以见义勇为为典型）的处理上，对管理人遭受的损失遵循适当补偿原则。^{〔4〕}

无论是《民法通则》时代，还是《民法总则》时代，我国实证法在处理无因管理中管理人遭受损害的救济问题上，区分规制所带来的矛盾贯穿始终。民法典编纂的过程中，立法者为了妥善解决上述争论，在无因管理制度中作出了巨大的变革。《民法典》第979条第1款对必要费用和遭受损害分别予以了明确，原则上认为必要费用需要予以赔偿，但是遭受损害则是适当补偿。《民法典》第183条针对特殊无因管理中管理人遭受损害的救济，与《民法总则》第183条并无区别，继续保持遭受损害的适当补偿原则。从这个角度来看，在民法典时代，无论是一般无因管理还是特殊无因管理，管理人遭受损害的救济，都采取了适当补偿原则，因而区分规制所带来的矛盾也因为统一规定被消解。不过这种统一规定并不当然化解所有矛盾，适当补偿本身的性质究竟是什么，具体在司法实践中如何确定其适当性，仍然是未来解释适用的难点。除此之外，适当补偿本身所承载的问题可能介入一般无因管理制度之中，管理人遭受损害的救济力度可能大幅下降。未来如何妥善解释必要费用和损害赔偿之间的关系，则仍然是解释论的重中之重。

（二）司法实践的不统一

一般无因管理中管理人遭受损害该如何救济，司法实践主要有四种不同的做法。首先，有的判决直接将一般无因管理和特殊无因管理杂糅，一开始明确应当根据《民法通则》第93条的规定，肯定管理人享有必要费用求偿权，再根据《民通意见》第132条的规定，认为必要费用包括直接支出的费用和遭受的损失。但是在遭受人身损害问题上，又直接援引特殊无因管理的规定，认为应当适用《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2003）第15条的规定，适用适当补偿原则。^{〔5〕}其次，有的判决则并不认为一般无因管理可以适用特殊无因管理的规定，仍然强调本人需要对管理人的必要费用和实际损失进行赔偿，并不适用适当补偿的规定。不过在实际损失的具体确定上，该种判决认为残疾赔偿金、精神损害抚慰金、营养费等均不属于支出的必要费用或实际损失，而对于医疗费、护理费、鉴定费和伙食补助费都全额予以支持。^{〔6〕}再次，有的判决虽然认为本人无需全部予以赔偿，但是其基本思路是认为无因管理仍然需要对实际损失全部赔偿，只不过在具体操作的过程中，管理人往往自身也具有过错，因而适用过错相抵原则减少责任的承担。^{〔7〕}最后，还有的判决虽然以过错相抵原则为出发点，但是认为应当综合考量事故原因、损害事实、损害后

〔3〕 参见刘凯湘：《债法总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41页。

〔4〕 参见王竹：《见义勇为人为人受损受益人补偿责任论——以〈民法总则〉第183条为中心》，载《法学论坛》2018年第1期。

〔5〕 参见广西壮族自治区河池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桂12民终1264号民事判决书。

〔6〕 参见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2010）浙甬民一终字第419号民事判决书。

〔7〕 参见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苏06民终3439号民事判决书；湖北省咸宁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鄂咸宁中民终字第468号民事判决书。

果等因素,最终确定所需承担的赔偿责任,运用多因素考量确定责任范围。〔8〕

就特殊无因管理而言,管理人或救助入遭受损害的救济,其实主要体现为人身损害,司法实践中主要有四种不同的做法。首先,有的判决在救助入遭受人身损害之时,直接根据《民法通则》第109条和《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2003)第15条的规定,不管发生损害的具体情形,直接确定一个补偿数额,对补偿数额并没有进行解释,同时该数额往往大幅度低于遭受的损害。〔9〕其次,有的判决在救助入遭受人身损害之时,并没有援引特殊无因管理的规定,即关于见义勇为的规定,而是直接适用一般无因管理的规定,主张应当对必要费用和实际损失全部赔偿,这些案件主要适用的法条是《民通意见》第132条。〔10〕再次,有的判决是针对特殊情况的处理,在管理人自身因素引发损害之时,如管理人本身有高血压病史,实施救助行为导致病发,此时考虑到救助行为属于诱发原因,因而让受益人承担一定比例的责任。〔11〕最后,还有的判决并没有明确界定见义勇为和无因管理的关系,同时也没有援引特殊无因管理中遭受损害的规定,而是直接适用我国《民法通则》和《侵权责任法》中关于公平责任的规定,认为本人并无过错,但从公平原则及弘扬社会互助等方面考虑,应当给予救助入一定的经济补偿。〔12〕

司法实践所呈现出来的态势,一种是一般无因管理会援引特殊无因管理的规定,另一种则是特殊无因管理会直接适用一般无因管理的规定。针对管理人所遭受的损害,如果适用适当补偿的规定,补偿的数额往往较低,难以和管理人遭受的损害相匹配。司法实践中对适当补偿的定位,似乎并没有定性为损害赔偿,而是纳入公平责任范畴,该种选择表现为,一些判决并没有援引特殊无因管理的规定,而是直接适用了《民法通则》和《侵权责任法》中公平责任条款。此外,通过对大量案例的分析,我们也不难发现,如果管理人遭受损害的数额相对较低,通常是财产损失的情形下,往往法院会对全部损害予以支持,但是如果管理人遭受损害的数额相对较高,尤其是管理人遭受重大人身伤害或者丧失生命之时,法院通常情况下会适用适当补偿的规定,并且补偿的数额一般较低。司法实践中这种区分人身损害和财产损失进行处理的方式,一定程度上来源于我国《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2003)的规定。该解释第15条针对特殊无因管理中管理人遭受人身损害的赔偿,认为受益人可以在受益范围内给予适当补偿,从司法解释的考量来看,主要是担心人身损害的赔偿额较高,如果对此全部予以赔偿,反而会给受益人带来巨大的负担。但是,这种区分本身是否合理,一直以来是理论争论的焦点,再加上《侵权责任法》《民法总则》和《民法典》并没有延续《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2003)中限定人身损害和受益范围的规定,司法实践中适用的不统一也由此而生,何时全部赔偿、何时适当补偿,法官无法对此准确把握。

(三) 损害救济初步结论

从规范性文件的沿革以及司法实践的不统一,我们不难看出,无因管理中管理人遭受损害的

〔8〕 参见安徽省宣城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宣中民一终字第00222号民事判决书。

〔9〕 参见福建省闽侯县人民法院(2016)闽0121民初2357号民事判决书;渭南市中级人民法院(2012)渭中法民一终字第00267号民事判决书。

〔10〕 参见浙江省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2002)越民初字第767号民事判决书。

〔11〕 参见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黑01民终5872号民事判决书。

〔12〕 参见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徐民终字第3330号民事判决书。

救济确实存在不同的观点。早期规范性法律文件并没有对管理人遭受损害予以重视，只是强调对管理人支出的必要费用予以赔偿，但是随着实践不断发展，管理人在实施管理行为之时遭受损害的情形越来越常见，尤其是在特殊无因管理中，因为管理情形的紧迫性，遭受损害的情形则更为常见。为了鼓励社会互帮互助之风，我国司法解释对必要费用做了扩大解释，认为其涵盖管理活动中直接支出的费用和实际受到的损失。^{〔13〕}由此来看，从一般无因管理的宏观理解上，我国司法实践似乎初步肯定了对管理人遭受损害的救济。但是这种完全赔偿的方式，在许多案件中，尤其是管理人因为管理遭受人身损害的情形下，本人将会面临巨大的赔偿责任，这给本人带来了难以预估的负担。这在特殊无因管理中尤为典型。为了限制这种超出本人预估的责任，无论是《民法通则》和《民通意见》，还是《侵权责任法》和《民法总则》，都认为特殊无因管理人，也就是见义勇为中的救助者，仅享有适当补偿的权利。

基于立法和裁判的变革，我们可以确定的是，我国实际上从早期肯定对管理人实际损失救济，发展到限制部分无因管理中管理人遭受损害的救济。针对限制的部分，从早期只限定遭受人身损害的救济，后来逐步扩展到对管理人遭受所有损害的限制。从现阶段的发展来看，尤其是随着《民法典》的实施，该种对损害的限制，已经扩展到所有的无因管理案件中，并不局限于见义勇为案型。^{〔14〕}但不可否认的是，适当补偿在我国一直架构在公平责任原则之上，其基本的理论出发点是对本来不需要予以救济的损失，基于公平原则考量给予适当补偿。^{〔15〕}该种从本来不需要予以救济、到后来基于公平原则考量给予适当救济的路径，必然只能是基于社会人道的原因，因而其救济的力度往往较低，甚至仅仅是象征性的救济。^{〔16〕}其实，无因管理中管理人遭受损害的救济，与上述公平责任原则存在一定的差异，其根本出发点在于本来就需要救济，但是因为某些情形下，尤其是管理人遭受人身损害之时，考虑到救济赔偿额畸高，因而需要予以适当限制。在此基础上，从《民法通则》以来，我国一直有限制管理人损害救济的倾向，但是其与公平责任原则仍然存在巨大差异。如果不恰当地架构在公平责任原则之上，反而会降低对管理人的保护，不利于提倡社会互帮互助之风。^{〔17〕}因而，解释论上如何妥善安排管理人遭受损害的救济，在何种情形下需要全部予以救济，在何种情形下需要予以限制，限制的考量因素是什么，这些都是未来理论研究的重中之重。

三、解释论的可能路径

管理人遭受损害的救济是和必要费用的偿还一致，按照无因管理之债来展开，原则上肯定其

〔13〕 我国学者在经典教科书上亦多支持对管理人遭受的损失予以救济。参见张俊浩主编：《民法学原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859页；魏振瀛主编：《民法》，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583页。

〔14〕 我国早期有学者在论著中已经认为一般无因管理中管理人遭受损害的救济，也应当适用适当补偿。参见前引〔3〕，刘凯湘书，第41页。

〔15〕 参见程啸：《侵权责任法》，法律出版社2015年版，第104页。

〔16〕 参见河南省罗山县人民法院（2008）罗民初字第517号民事判决书；河南省南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04）南民一终字第75号民事判决书；四川省雅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川18民终1272号民事判决书。前两个判决几乎是在对半补偿，最后一个则象征性的确定补偿额，总的来说确定数额的原因未进行分析，补偿额远远低于损害额。

〔17〕 我国还有学者提出了“法定补偿义务说”来代替公平责任，但是两者均强调分担损失的功能，除了解释路径上的差异，并没有本质区别。参见王轶：《作为债之独立类型的法定补偿义务》，载《法学研究》2014年第2期。

完全救济,仅在遭受损害的类型上进行控制,还是采用和必要费用偿还不一致的做法,仅引入适当补偿的救济方式,并不就管理人遭受的损害全部赔偿,对此,比较法上不同的国家采用了不同的做法,综合来看如果对必要费用和遭受损害采取统一态度,我们可以称之为一元模式,如果对必要费用和遭受损害采取不同态度,我们可以称之为二元模式。当然我们还应当注意的是,如果对于无因管理的类型进行分类,针对不同的无因管理类型采用不同的模式,立法论上还会出现一元模式和二元模式的杂糅情形。下面笔者将结合比较法和我国的立法、解释现状予以展开。

(一) 一元模式构造

一元模式的核心在于,无论是基于主观自愿而支出的费用,还是非基于主观自愿而遭受的损害,原则上都需要予以赔偿,并不会采取不同的救济理论。一元模式具体则又体现为两种构造,一种是直接利用“必要费用”来统合自愿性支出和非自愿性损害,另一种则是分别规定自愿性支出和非自愿性损害,但是无论如何规定,都肯定了对管理人予以赔偿。一元模式构造最为典型的立法例即为德国和我国台湾地区,德国法在立法上对遭受损害的救济保持了沉默,解释论上借助于“必要费用”来统合,而我国台湾地区则直接在相关规定中区分自愿性支出费用和非自愿性遭受损害,并且认为都需要予以赔偿。

就德国法而言,根据《德国民法典》第683条第1句和第670条,本人需要承担管理人所产生的费用,这个请求权比不当得利范围还要广,并不限于受害人获利的范围,而是包括一切被认为有必要的费用,更进一步,德国法扩张解释了必要费用的范围,将损害赔偿请求权纳入其中。^[18]即便如此,德国法也不是对管理人受到的所有损失进行救济,而是认为应当对该种损害赔偿请求权进行限制。德国学者认为,除了损害和事务执行具有事实因果关系之外,损害必须归因于委托的执行,两者之间具有相当性。当然,也并非所有具有相当因果关系的损害都需要进行救济,在讨论委托合同受托人损害赔偿之时,德国学者就认为《德国商法典》第110条第1款的规定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指引,该条认为公司对“直接因执行业务或与执行业务不可分离地联系在一起的危险而遭受损失的”股东应当负担赔偿义务。^[19]因而,委托合同应当类推适用上述标准,无因管理制度借助委托合同的媒介,也应遵循这一判断方法。根据该标准,本人实际上承担的是风险责任,如果损害来自与管理密不可分的风险,则损害应当与费用等同视之。^[20]德国学者认为,不能仅仅因为本人没有过错,就排除完全赔偿原则的适用,因而固有风险下的损害都需要救济。^[21]除此之外,德国有学者对精神损害和死亡赔偿金等问题,也保留了救济的可能性。^[22]

与德国法模式不同的是我国台湾地区的规定,台湾地区“民法”第176条表现得极为直接,其认为管理人在管理的过程中,无论是支出的必要或有益的费用,或者是为管理所负担的债务,

[18] Vgl. Wolfgang Fikentscher/Andreas Heinemann, Schuldrecht 10., völlig neu bearbeitete Auflage, Rn. 1270, Rn. 1273.

[19] Vgl. MüKoBGB/Schäfer, 7. Aufl. 2017, BGB § 670, Rn. 16; Peifer, Schuldrecht-Gesetzliche Schuldverhältnisse, 5. Auflage, Nomos, 2017, S. 302.

[20] 德国学者将需要救济的损害称为“典型风险下的伴随损害”。参见前引[19], Peifer书,第302页。

[21] 当然司法实践也有例外,有的判决类推适用《德国民法典》第670条的规定,认为仅就典型的与风险相关的损害给予适当、公平的赔偿。Vgl. Wandt, Gesetzliche Schuldverhältnisse, 9. Auflage, 2019, Verlag Franz Vahlen, S. 64.

[22] 参见前引[21], Wandt书,第64页。

抑或者是管理活动中遭受的损害，管理人都可以向本人请求赔偿。台湾地区学者在此基础上认为，并非所有的损失都需要予以救济，只有那些与管理行为具有相当因果关系的损害需要进行救济。^{〔23〕}基于此可知，我国台湾地区并没有对无因管理中管理人的损害赔偿请求权进行额外的限制，仅仅是采用了确定损害的一般理论即相当因果关系理论。从形式上来看，台湾地区的规定似乎最为宽泛，并不去限制遭受损害的救济，这较之于德国法显得相对宽松。^{〔24〕}不过相当因果关系理论中也暗含着可预见性理论，其本身具有一定的连通性，在规范性评价之下，对于遭受损害的救济，同样可以起到限制的作用。^{〔25〕}例如在日本，许多学者主张采预见可能的类型化说，该种观点认为，应当根据无因管理人能否预见到损害的发生来决定，一般情况下“偶然损害”并不属于管理人预见的范围，对于自己可以预见的财产损害则应当纳入救济范围之内，如救助落水者而污损衣物等。^{〔26〕}对于管理人所遭受的人身损害，是否属于预见的范围，则存在不同的观点，但是日本主流学说似乎认为，人身损害并不在预见的范围之内，因而不需要予以救济。^{〔27〕}日本公法对见义勇为的救助则较为发达，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私法的发展。

我国《民法通则》第93条和《民通意见》第132条就一般无因管理规定，管理人遭受损害之时本人应当给予赔偿。不过该种赔偿并非是对管理人在实施无因管理的过程中遭受的一切损害予以救济，同样需要考量哪些损害和管理行为具有相当因果关系，同时也要关注该种损害是否属于本人的预见范围之内，即对相关损害进行可预见性评价。从这个层面来理解，针对一般无因管理，认为我国法对管理人受到的全部损失予以救济并不完全准确，更准确的说法是，我国法强调的是对管理中合理的损害进行救济，而合理性的判断则借助于相当因果关系理论和可预见性理论。^{〔28〕}因而，在一元模式中，管理人遭受损害的救济，一般定性为损害赔偿赔偿责任，虽然均强调对管理人遭受损害的赔偿，但是该种赔偿针对的并不是一切损失，而是在规范评价下的特定损失。一般该种损失被纳入救济的范围中，那么自然也就需要予以全部赔偿，所以说一元模式下管理人遭受损害的救济，主要是通过对损害类型化，并最终确定哪些损害需要予以救济。

（二）二元模式构造

二元模式的核心在于，区分自愿性支出的费用和非自愿性遭受的损害，运用不同的救济原则进行规制。对于必要或有益费用，原则上应予全部赔偿，但是针对非自愿性遭受的损害，则采用弹性条款的方式，放弃了完全赔偿原则。二元模式在具体的构造上，针对损害赔偿的救济存在两种不同的立法模式，一种模式是在公平责任原则下进行构造，进而认为需要对管理人予以适当补偿，另一种模式则是在完全赔偿原则下进行修正，认为对于管理人遭受的损害需要予以赔偿，但

〔23〕 参见史尚宽：《债法总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68页；王泽鉴：《债法原理》，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325页。

〔24〕 我国学者也有持相当因果关系来限制损害赔偿的观点。参见前引〔1〕，崔建远、韩世远、于敏书，第224页。

〔25〕 参见李中原：《论侵权法上因果关系与过错的竞合及其解决路径》，载《法律科学》2013年第6期。此外，我国台湾地区学者还强调，无因管理下的损害赔偿与完全赔偿原则有一定的差距，原则上管理人不得请求报酬。参见邱智聪：《新订民法债编通则》（上），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64页。

〔26〕 参见〔日〕我妻荣：《债法各论》（下卷一），冷罗生、陶芸、江涛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8年版，第32页。

〔27〕 参见章程：《见义勇为的民事责任——日本法的状况及其对我国法的启示》，载《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4年第4期。

〔28〕 参见金可可：《〈民法典〉无因管理规定的解释论方案》，载《法学》2020年第8期。

是具体赔偿额的确定则需要多因素考量。^{〔29〕}正如上文所述,适当补偿和损害赔偿是基于不同的出发点对管理人遭受损害进行救济,上述二元模式构造的选择,也决定了一国对管理人遭受损害救济的力度。比较法上持二元模式的主要有奥地利和瑞士,奥地利法属于在公平责任原则下进行构造的模式,而瑞士法则属于对完全赔偿原则予以修正的模式。

《奥地利民法典》并没有明确规定委托合同和无因管理中,受托人和管理人遭受损害的救济。但是,奥地利学术界一般认为,在委托合同中,受托人在处理委托事务之时,因为委托事务固有的风险遭受损害的,受托人可以依据《奥地利民法典》第1014条主张损害赔偿救济,该种责任是不以委托人过错为前提条件的风险责任。^{〔30〕}就特殊无因管理中管理人遭受损害的救济,奥地利通说采用了同样的观点,认为也应当适用上述风险责任,有的学者甚至主张在一般无因管理中,也适用上述风险责任,不过应当以本人获益范围为限额。^{〔31〕}但是奥地利本国的司法实践拒绝了上述观点,该国实际上采取了公平责任说的观点,认为无因管理中管理人遭受损害的救济,应当引用《奥地利民法典》第1306a条和第1310条对管理人进行适当补偿。其司法实践认为,本人是否需要承担损害赔偿,以及损害赔偿的范围具体是什么,取决于个案的具体情况。法官综合考量受益人所面临的危险、管理人致害的风险、损害的类型和程度、主体对危险产生的原因力、主体的经济承受能力等因素,最终确定损害赔偿的范围。^{〔32〕}因而,奥地利法实际上并没有肯定管理人的损害赔偿请求权,只是认为受益人应当基于公平责任,给予管理人或者救助者适当补偿。我国有学者在见义勇为中救助者遭受损害的救济上即采纳了该种观点。^{〔33〕}

其次,就瑞士法而言,主流观点认为对于费用和债务以外的财产损害和人身损害,并不予以完全赔偿,它的赔偿范围取决于法官在个案中具体的裁量,其并不完全以因果关系作为主要依据,考量重点在于事务的固有风险。^{〔34〕}实际上瑞士法是在考虑管理事务固有风险的前提下,交由法官对损害进行具体裁定。根据《瑞士债务法》第422条以及瑞士联邦最高法院的相关审判实践,法官需要具体考量案件中的相关要素,进行综合衡量后予以具体确定。具体而言,法官应当考量的因素如下:危险的程度、法益的价值、主体的财产情况、危险和救助风险的比例关系、事务管理的效果、管理人是否具有专业身份、主体的过错、可归责于当事人的行为方式和具体情节等。^{〔35〕}因而,从上述规定来看,瑞士法仍然是在损害赔偿原理下讨论管理人遭受损害的救济,但是认为应当对具体的损害赔偿额予以衡平裁减,在瑞士法语境之下,该种损害赔偿是公平责任和风险责任的结合。瑞士法的方案在欧洲范围内不乏支持者,德国和荷兰的学说也有所体现,判例中亦有上述理论的痕迹。^{〔36〕}更进一步,在《欧洲示范民法典草案》中,第5—3:104条第2

〔29〕 参见王雷:《见义勇为行为中受益人补偿义务的体系效应》,载《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4年第4期。我国亦有学者对两种模式不加严格区分。参见李中原:《论无因管理的偿还请求权——基于解释论的视角》,载《法学》2017年第12期。

〔30〕 Vgl. Fitz, Risikozurechnung bei Tätigkeit im fremden Interesse, Berlin: Duncker & Humboldt, 1985, S. 74ff.

〔31〕 参见缪宇:《论救助者对见义勇为者所受损害的赔偿义务》,载《法学家》2016年第2期。

〔32〕 Vgl. OGH 2 Ob 46/95; 3 Ob 507/96.

〔33〕 参见前引〔15〕,程啸书,第111页。

〔34〕 Vgl. BGE 129 III 181.

〔35〕 参见前引〔31〕,缪宇文。

〔36〕 参见〔德〕克里斯蒂安·冯·巴尔、〔英〕埃里克·克莱夫主编:《欧洲私法的原则、定义与示范规则:欧洲示范民法典草案》(全译本)(第5卷、第6卷、第7卷),王文胜等译,法律出版社2014年版,第164页。

款明确规定，在公平合理的范围内，应减少无因管理人请求权的金额或排除这些请求权。不管上述衡平裁量如何操作，瑞士法模式仍然是在损害赔偿理论下展开，只是介入了实质评价的因素。

就特殊无因管理也即见义勇为的规定，我国实证法同样采取了二元的模式，关于自愿性支出的费用，适用《民法通则》第93条的规定，原则上认为需要予以全部赔偿。但是针对非自愿性遭受的损害，则应当适用《民法通则》第109条的规定，对救助他人遭受的损害予以适当补偿。从具体法律规定来看，《侵权责任法》对于见义勇为条款的位置设定为紧邻公平责任条款，在语词选择上采纳了公平责任的表述，同时，早期《民通意见》第142条在确定补偿额之时，所考量的因素仅有受益人受益的多少和受益人的经济状况，该种文义内涵揭示出公平责任的架构。^{〔37〕}在司法实践中，法官关于见义勇为案件中救助他人遭受损害的救济，往往也是基于公平原则或者根据救助人和受益人的经济状况确定适当补偿的数额，从最终确定的补偿额来看，并不能与救助他人遭受的损害相匹配。即便有些学者试图跳出公平责任原则对适当补偿予以构造，但是就考量的因素来看，仍然带有很强的社会救助性质，无法摆脱公平责任的影响。^{〔38〕}就此来看，我国制定法上针对特殊无因管理采纳了二元模式构造，并且归属于奥地利模式，但是在具体确定补偿额的时候，考量的因素相对较为单一，司法实践中所确定的补偿额一般较低，这反而不利于对特殊无因管理中管理人的保护。这虽然是实践的保守造成的，但是理论对此不得不加以审视。

（三）杂糅模式矛盾

基于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我国早期的制定法实践，尤其是在《民法典》出台之前，在一般无因管理领域采纳了一元模式构造，而在特殊无因管理领域采纳了二元模式构造。如果严格贯彻我国制定法上的规定，特殊无因管理的规定属于特别法，因而特殊无因管理中管理人遭受损害的，可以向本人主张适当补偿，对其无法援用一般无因管理全部赔偿的规定。同样的，一般无因管理并不当然属于特殊无因管理，特殊无因管理的规定并不能适用于一般无因管理，因而一般无因管理中管理人可以对自己遭受的损害，至少是和管理行为紧密相关的损害，获得全部赔偿。适当补偿在我国适用的逻辑在于，原本不需要赔偿，基于社会救助观念，对管理人进行适当补偿，因而其救济的程度十分有限，从这个层面来看，我国的制定法实践对一般无因管理中管理人的保护，反而要强于特殊无因管理中管理人。解释论上通常认为我国《侵权责任法》第23条和《民法总则》第183条对应的是见义勇为案型，我国一直强调对见义勇为行为人的保护，但是在具体操作中，其保护力度反而低于对一般无因管理中管理人的保护，该种评价差异的妥当性颇值怀疑。^{〔39〕}

正是由于评价上存在的问题，司法实践中许多判决并不受制于一般法条和特殊法条的规定，法院在许多特殊无因管理的案件中，会直接适用一般无因管理的规定，而在许多一般无因管理的案件中，同样会直接适用特殊无因管理的规定。之所以会出现如上突破法条理论适用法律的情形，主要有如下两个原因：第一，在特殊无因管理中，许多情形下管理人遭受的损害属于实施救助行为固有的风险，其发生的概率往往较高，受益人也能预见该种损害的发生，此时如果仍然适用适

〔37〕 适当补偿在我国侵权法上一直以来都和公平责任联系在一起，在条文设置上我国《侵权责任法》许多适当补偿条款都和公平责任相关联，此外从条文的安排上见义勇为的规定和公平责任条款也相毗邻。

〔38〕 参见前引〔17〕，王轶文。

〔39〕 参见冯德淦：《见义勇为中救助他人损害救济解释论研究》，载《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20年第2期。

当补偿的规定,显然难以合理保护管理人的利益,无异于扼杀民事主体实施救助行为的积极性;第二,在一般无因管理中,许多情形下管理人遭受的损害不属于管理行为固有的风险,或者即便属于管理行为固有的风险,但是其损害数额非常巨大,超出了无因管理中本人承受能力,在该种情形下,完全赔偿原则反而会给本人带来生计困难,难以合理平衡本人的利益。

我国早期立法就一般无因管理采一元模式的构造,本身并没有揭示管理人遭受的哪些损害需要予以救济,如果不加限制地予以救济,会忽略对无因管理中本人的保护。特殊无因管理中二元模式的构造,将适当补偿架构在公平责任原则之上,法院判决时象征性地确定补偿额,大幅度降低了对管理人的保护。上述两种做法都不具有正当性。客观地说,《民法典》将管理人遭受损害的救济统一规定,以此来化解一般无因管理和特殊无因管理之间的矛盾,在体系统一上确实有积极的意义。但是从横向比较来看,《民法典》却针对必要费用和遭受损害的救济,采取了不同的评价,认为必要费用全部赔偿,而遭受损害适当补偿,该种区分似乎预示着我国制定法想采用二元模式构造。然而,如果对司法实践稍加整理,我们不难发现,适当补偿在我国一直被架构在公平责任之上,相较于瑞士法和奥地利法,法官往往象征性地确定补偿额,很难实现对管理人或者救助人的保护。^[40]从类型构造上来看,管理人支出的费用一般是基于主观意愿,管理人遭受的损害一般则是基于管理的风险,如果对支出的费用予以全部救济,而对遭受的损害仅仅是适当补偿,忽略了两者都是为了合理的实施无因管理和恰当的完成管理事务,对两者从根源上予以区别对待并不合理。其实不管《民法典》对管理人遭受损害的救济如何规定,其都无法改变损害救济的评价属性。合理的平衡管理人和本人的利益,通过对损害的类型区分,以及借助于外部衡平控制,仍然是未来解释论研究的重点。

四、我国解释论的展开

(一) 必要费用和损害赔偿

一国法秩序对是否采纳无因管理制度可能存在不同观点,但是如果出于倡导社会互助价值而采纳该制度时,管理人因为管理而产生的合理财产性支出,本人应当予以赔偿,并不会存在太大争论,不过究竟救济到何种程度则仍然需要予以反思检讨。救济的范围主要涵盖两个层面的支出,一种是自愿性的财产支出,另一种则是非自愿性的利益减少。前者主要包括费用支出和所承担的债务,后者则主要是指执行事务过程中遭受的损害。^[41]

首先,就执行事务自愿性的费用支出,理论上要求以必要性作为考量依据。该种必要性的判断,主要依赖于客观理性人的标准。^[42]管理人在实施管理行为之时,必须去仔细考虑该种费用支出或者产生的债务,是否具有客观必要性,是否对于本人具有积极价值。^[43]该种客观必要性

[40] 我国实证法中“适当补偿”在司法实践中带来的副作用是十分巨大的,在一些判决中,如果涉及第三人侵权的,甚至有裁判直接将之理解为“补充责任”,并且确定数额之时,酌情赔偿的比例甚至没有达到百分之五十。参见四川省南充市中级人民法院(2013)南中法民终字第232号民事判决书。

[41] 由于费用支出和债务承担在理论上具有一致性,下文在讨论过程中仅以费用支出作为讨论的切入点。

[42] 参见前引[23],王泽鉴书,第325页。在必要费用的判断上,亦有学者持主观标准说。参见前引[28],金可可文。

[43] Vgl. BGH 1989, 1285; RGZ 149, 205, 207.

的判断以执行管理时作为判断时间点。^{〔44〕} 自愿性费用支出的赔偿与管理行为所追求的目的是否最终达成并无必然的关联性，也就是说只要管理人主观上有管理的意思，客观上也合理地实施了管理行为，即便并没有达到本来所欲追求的目的，本人也需要对管理人自愿性财产支出予以赔偿。^{〔45〕} 自愿性费用支出必要性的判断，本身是一个评价问题，例如德国有学者就认为，在特殊无因管理中，尤其是紧急状态下的无因管理，对支出费用必要性的判断，可以准用《德国民法典》第 680 条的规定，无需继续以客观理性人作为标准，即便是一般过错所支出的费用，本人也需要予以赔偿。^{〔46〕} 因而，我们可以确定并非所有自愿性财产支出都需要予以赔偿，仅在符合必要性的条件之时，才需要对管理人进行救济，但是必要性判断在不同的案件中需要不同的评价，其本身也不是不加区分的完全赔偿，而是结合损害和管理事务的内在联系予以确定。

其次，就执行管理事务遭受的损害，理论上仅对固有风险下的损害予以救济。因为管理人遭受损害并非自愿性支出费用，我国《民法通则》针对一般无因管理直接采纳必要费用的表述，实际上体现了立法者相对开放的观点，既可以扩张必要费用涵盖遭受损害的救济，也可以严格解释必要费用排除救济。^{〔47〕} 值得强调的是，无论是基于意思表示的委托合同，还是非基于意思表示的无因管理，受托人或者管理人除了需要付出劳动之外，并不需要对执行事务过程中典型的业务风险承担责任。^{〔48〕} 该种典型的业务风险实际上是事务固有的风险，可以被当事人预见，并且和事务的执行具有确定的概率关系。^{〔49〕} 即便是委托人或者本人自己来执行事务，同样可能产生上述风险损害，因此委托人或者本人应当对该种损害予以赔偿。我国《合同法》第 398 条规定，委托人需要对受托人支出的费用予以偿还。第 407 条进一步规定，受托人在执行委托事务受到损失的，委托人应当予以赔偿。需要提及的是，上述规定在《民法典》中也并没有作出改变。之所以如此规定，不在于意思表示的存在，而在于无论是支出的费用还是所受到的损失，只要和执行事务具有必然相关性，受托人就应当对此予以赔偿。自愿支出的费用和非自愿遭受的损害，本质上都是因为执行事务，导致受托人或者管理人财产上的减少。因而，即便在缺乏委托意思的无因管理中，如果一国法秩序提倡无因管理，那么就不能否认管理人遭受损害的救济，仅有的控制只能是对损害的类型予以区分，排除那些非固有风险的损害。^{〔50〕} 或许我国规范文义上的“适当补偿”的适当性要求意义恰恰在此。

综合上述自愿性支出的费用和非自愿性遭受的损害来看，两者之间以管理人自愿性作为区分依据，有学说认为自愿性支出需要予以全部救济，而非自愿性支出则不需要全部救济，也正是基于上述学说，比较法和我国理论一直对费用的赔偿予以支持，但是对于管理人遭受的损害则显得

〔44〕 参见前引〔21〕，Wandt 书，第 62 页。

〔45〕 BGH ZIP 1991, 862, 863.

〔46〕 参见前引〔21〕，Wandt 书，第 62 页。

〔47〕 我国也有学者主张严格解释必要费用，排除一般无因管理中遭受损害的赔偿，以此来避免矛盾。参见吴训祥：《论无因管理本人的偿还义务——兼论〈民法总则〉第 183 条第 2 句的适用问题》，载《法学家》2019 年第 2 期。

〔48〕 参见前引〔21〕，Wandt 书，第 63 页。

〔49〕 Vgl. BGHZ 52, 115; BGH NJW 1993, 2234, 2235.

〔50〕 其实，如果严格区分委托合同和无因管理，分别对遭受损害救济进行反思，有意思表示的委托合同，反而更有可能借助意思表示的解释，排除掉损害的救济。因为有偿委托合同中的对价，在某些情形中，有可能本来就包含遭受损害的对价，此时当然可以排除掉损害的救济，但是无因管理并无上述排除的可能性。

模糊不清。^[51] 有些理论直接认为不需要赔偿,有些理论则采取了折中的方法,认为应当基于公平责任原则予以适当补偿。不管采取什么样的理论,我们至少可以确定的是,我国主流学说一直对管理人遭受的损害,采取了限制救济的观点。自愿性支出的费用,如果是管理人理性支出的,通常情况下符合客观理性人标准,大部分都是合理的,所以我们一般都会认为自愿性支出的费用都需要救济。但是,自愿性仅仅为费用的合理性判断提供了基础保障,并不必然导致费用的可赔偿性,费用是否需要予以救济,仍然应当以“必要性”作为判断依据,上文已经就此指出,应当按照客观理性人的标准进行具体评价。同样地,非自愿性遭受的损害虽然不具备自愿性,但是自愿性的缺失应当仅仅影响损害的判断,具体方法上可能会选择不同的切入点。该种自愿和非自愿的区分,并不会一刀切地否定对损害的救济,如果管理人遭受的损害是事务执行的固有风险,即便是本人自己也会面临该种风险,那么该种固有风险下的损害和支出的必要费用并无本质区别,在具体案件中进行解释适用之时,更无区分规制的正当性。

自愿性支出的费用需要满足必要性,而非自愿性遭受的损害则需要基于固有风险而产生,就此来看,无论是借助于必要费用来统合两者,还是分别用费用和损害区分两者进行规制,我们都不能否定管理人就此产生的财产减少,本人需要对此予以填补。既然都是为了更好地实施无因管理而产生的财产性减少,制定法并无正当理由从根源上予以区别对待,恰当的做法是,在考量管理行为特征的情况下,对管理人财产上的减少予以赔偿。同时,基于体系上类似制度的比较,制定法关于互帮互助的法律制度,原则上也肯定了对提供帮助人遭受损害的赔偿,典型的是无偿帮工的规定,《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2003)第14条就肯定了帮工人遭受人身损害的救济,而且采用的是赔偿而不是补偿。为了保持法价值在体系上的一致性,该种做法同样应当在无因管理中予以坚持。从赔偿的数额来看,自愿性支出的费用通常情况下并不会高于本人可能获得的利益,因而大多数情况下并不需要予以限制。但是非自愿性遭受的损害,尤其是管理人遭受人身损害的情形,此时赔偿额有时可能非常巨大,往往会给本人带来沉重的负担,尤其在本人没有任何过错之时,无因管理之债对此要求本人予以全部赔偿,正当性根基受到其他价值的冲击。也正是出于该种原因,我国许多学者主张对完全赔偿原则予以控制。^[52] 客观地说,如果对管理人遭受的损害进行赔偿已经超出了本人承受范围,或者说给本人的生计带来困难,法律确实应该对该种赔偿责任予以限制,但是究竟如何合理限制,仍然需要进一步探究。^[53]

(二) 适当补偿的理论架构

为了合理限制损害赔偿的数额,在特殊无因管理中,《民通意见》第142条规定,赔偿权利人可以根据受益人受益多少及其经济状况,请求受益人给予适当补偿。^[54] 由此不难看出,我国规范性文件为了限制损害赔偿的数额,引入了因素考量的方法,尤其以受益人受益多少和经济状

[51] 德国学者认为对于特殊无因管理遭受损害应当予以救济,而对于一般无因管理下遭受损害的救济问题,则有一定争论。Vgl. MüKoBGB/Schäfer, 7. Aufl. 2017, BGB § 670, Rn. 29.

[52] 参见前引[29],王雷文。

[53] 我国近来许多学者在反思损害赔偿原则的框架下,主张引入生计酌减和公平酌减。具体可参见徐银波:《论侵权损害完全赔偿原则之缓和》,载《法商研究》2013年第3期。

[54] 许多学者正是在限制损害赔偿额的目的下主张引入适当补偿责任的,其把适当补偿责任理解为是对完全赔偿原则的突破,利用动态体系论来确定补偿责任。参见前引[29],王雷文。

况作为考量依据。在人身损害赔偿的确定上,《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2003)第15条规定,赔偿权利人可以请求受益人在受益范围内予以适当补偿,试图借助于受益范围来对损害赔偿的数额进行限制。该方法至少有如下两个问题:其一,错误的混淆了不当得利制度和无因管理制度,无因管理并不能以受益范围作为赔偿标准,统一限制的做法不利于提倡社会互助;其二,即便以受益范围作为赔偿标准,也不宜适用对人身利益实施救助的行为,尤其是救助他人生命的情况,因为生命的价值不能以金钱来评估,上述限制在许多情况下并不能起到作用。除此之外,我国规范性文件在限制损害赔偿数额之时,存在的最大问题在于,将管理人遭受损害的救济,借助于适当补偿的规定,直接嫁接到公平责任原则之上,这种救济逻辑的弊端是以本来不需要救济作为出发点,因而大幅度降低了对受害人的救济,不利于无因管理制度价值的实现,有矫枉过正的嫌疑。

适当补偿在文义上来看,确实有解释为公平责任的倾向,但是这与无因管理制度的价值并不契合。因而,如果要在解释论上正当化适当补偿,我们应当认识到,适当补偿的重点不在于补偿,而是在于其所强调的适当性,就补偿的解释来看,仍然应当以无因管理之债来展开,肯定其损害赔偿的性质。^[55]至于适当性的解释,则需要借助于内外部协作控制的方法。

首先,就内部控制的方法,主要是借助于对损害的类型化构造,该种构造考量的标准就是管理事务固有的典型化风险。如果是管理事务固有的典型化风险,不管是财产损害,还是人身损害,原则上都需要予以救济。^[56]典型的有如下几种情况,在陡峭山上救人并最终坠入山下、为了救助他人被加害人一并殴打和为了避免撞人自己的汽车受到损害等。^[57]但是事务固有的典型化风险之外的损害,并不需要予以填补,例如一般生活风险导致的损害,应当被排除在救济范围之外,实践中的一个例子就是为了实施救援,驾车赶过去而引发交通事故。^[58]更为典型的则是为他人处理一般事务,诸如付款或者运输等等,但是在路上发生交通事故,还有就是救火员在救火完毕之后,组装收拾灭火器之时发生损害等。^[59]当然,固有风险下损害的确定也会因为管理事务的紧迫性,而采取不同的判断。如果是一般无因管理,原则上要求管理人没有过错,例如帮助外出的他人在台风到来之前收割水稻,因此导致衣服被弄脏,或者收割过程中被水稻划伤,这些损害只要在管理人没有过错之时,就需要予以全部救济。如果是特殊无因管理,相较于一般无因管理,可以降低对管理人的要求,即便管理人一般过错造成的损害,也应当纳入损害赔偿的范围中,例如为了救助落入水中的他人,管理人没有脱下衣物和拿出手机就跳入水中,最终导致衣物和手机损害,通常情况下该种损害也需要予以救济。^[60]根据德国相关学说,合理的精神损害

[55] 参见前引[28],金可可文。就司法实践中的情况来看,我国甚至有判决一审直接按照侵权责任来确定管理人的救济,二审虽然予以纠正,但是仍然以过错作为判断依据,受益人和介入的第三人按比例全部承担了责任。参见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2019)鄂28民终1828号民事判决书。

[56] 我国司法实践中,许多判决在确定管理人遭受损害救济范围之时,其实也主张类比必要费用的救济,即强调其中的“必要性”。如有判决就认为“管理人因管理活动遭受损害而产生的实际损失确实属于管理费用,但受益人依法应当偿还的应为必要费用”。台州市黄岩区人民法院(2019)浙1003民初5508号民事判决书。

[57] MüKoBGB/Schäfer, 8. Aufl. 2020, BGB § 683 Rn. 38; BGH 38, 270.

[58] 参见前引[21], Wandt书,第63页。

[59] MüKoBGB/Schäfer, 8. Aufl. 2020, BGB § 683 Rn. 38.

[60] 德国学者在必要费用的讨论上,同样区分一般无因管理和特殊无因管理,如在紧急救助的时候,为了将受伤的人送到医院,情急之下没有注意到附近就有医院,而是打车到了另一个医院,该种一般过错而导致的费用,受益人也应当予以赔偿。参见前引[21], Wandt书,第62页以下。

同样需要予以赔偿。^{〔61〕}我国司法实践对精神损害赔偿存在一定的争论,为了鼓励社会互助行为,笔者认为应当予以肯定。^{〔62〕}同时,在确定损害赔偿额之时,还应当注意类推适用过错相抵的规定,如果管理人在一般无因管理中存在过错,或者在特殊无因管理中存在重大过失,应当减少遭受损害的赔偿。^{〔63〕}

其次,就外部控制的方法,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损害额酌减制度,另一个则是公平责任制度。所谓损害额酌减制度,主要有生计酌减和公平酌减两种,前者是为了避免完全赔偿原则导致赔偿义务人生计困难,后者则是为了避免让善意的当事人承担全部责任。^{〔64〕}无因管理中管理人遭受损害的救济所涉及的主要是生计酌减,也就是说如果无因管理中管理人的损害赔偿请求权给本人的生计带来了严重的困难,法官可以对损害赔偿额予以酌减。比较法上的依据主要有《瑞士债务法》第44条第2款和我国台湾地区“民法”第218条,这些规定都强调如果损害赔偿义务人非以故意或重大过失造成损害,履行赔偿义务会导致义务人陷入窘困的境地,法院可以予以酌减。^{〔65〕}我国制定法虽然没有损害酌减制度,但是我国民法理论一直强调诚实信用原则和公平原则,从维持社会稳定和谐以及保护个人生存发展来看,解释论上我们应当采纳损害额酌减制度。当然,外部控制并不总是表现为减少损害赔偿额,有时还表现为加强对管理人的救济,尤其是在特殊无因管理的情况下。例如救助入自身有心脏病,但是为了在紧急状况下救人,不顾自身安危跳入水中救人,最终心脏病发作导致死亡,该种损害其实并不是固有风险下的损害,仅仅是自己的一般生活风险,因而受益人并不需要承担损害赔偿赔偿责任。但是出于对见义勇为行为价值的提倡以及满足救助入或者救助入继承人基本的生活需要,法官可以援引公平责任对救助入予以补偿。^{〔66〕}

(三)《民法典》解释构造

《民法典》第979条第1款针对适法的无因管理规定,管理人可以请求受益人偿还因管理事务而支出的必要费用,管理人因管理事务受到损失的,可以请求受益人给予适当补偿。结合第183条的规定,我们可以看出,《民法典》一改之前《民法通则》《侵权责任法》关于一般无因管理和特殊无因管理区分规定的做法,开始统合二者,对管理人遭受的损失一律采用适当补偿的规定。从立法的目的来看,该种统合对于避免体系内部的矛盾具有积极作用,但是规范目的却旨在对赔偿请求权予以限制。不过,较为吊诡的是,针对委托合同中受托人受到损失的,《民法典》第930条并没有采用适当补偿的规定,而是直接肯定受托人可以向委托人请求赔偿损失。因而,《民法典》区分了委托合同和无因管理,针对受托人和管理人遭受的损失,采用了不同的规范语词设计。从主流解释和实践操作来看,未来我国就无因管理中管理人遭受损害的救济,极有可能

〔61〕 Looschelders, Schuldrecht Besonderer Teil, 14., neu bearbeitete Auflage 2019, Verlag Franz Vahlen, S.367; Staake, Gesetzliche Schuldverhältnisse, 2014, Springer-Verlag, S.430.

〔62〕 否定精神损害赔偿的判决如广东省中山市中级人民法院(2003)中中法民一终字第948号民事判决书和台州市黄岩区人民法院(2019)浙1003民初5508号民事判决书等,肯定精神损害赔偿的判决书如湖北省咸宁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鄂咸宁中民终字第468号民事判决书等。

〔63〕 参见前引〔19〕,Peifer书,第302页;前引〔13〕,魏振瀛主编书,第584页。关于特殊无因管理,德国学者认为一般过失,排除过错相抵的适用,仍然需要全部救济。参见前引〔61〕,Looschelders书,第367页。

〔64〕 参见冯德淦:《侵权损害完全赔偿原则之新阐释》,载《西南政法大学学报》2018年第3期。

〔65〕 参见林易典:《论法院酌减损害赔偿金额之规范》,载《台大法学论丛》2007年(第36卷)第3期。

〔66〕 该种解释一定程度上也能进一步保障见义勇为者的利益。参见前引〔39〕,冯德淦文。

发展为以公平责任为根基的补偿责任，这种方式机械割裂委托合同和无因管理，仅仅因为意思表示是否存在，就对受托人和管理人遭受损害采用不同架构，前者仍然是完全赔偿，或者说是有条件的完全赔偿，后者则是象征性的部分补偿，该种区分并不具有正当性。^{〔67〕}

委托合同和无因管理的核心差异在于是否具有意思表示，但是意思表示的存在能发挥作用的仅是，影响当事人对损害的预见可能性强度，以及某些管理人自身的特质是否纳入考量，并不会影响那些固有损害的救济。也就是说，即便没有意思表示的无因管理，只要是管理事务固有风险下的损害，依然需要救济。如果从根源上否定管理人遭受损害的救济，就等于改变了我国私法的价值，向不特定的民事主体昭示，我国法价值上不再支持无因管理，甚至包括见义勇为行为。因此，从条文设计的合理性角度来看，《民法典》中关于管理人遭受损害救济的规定存在一定的偏差，解释论上应当重新确立在适法无因管理中，管理人可以向本人请求赔偿损失。当然我们也要注意到，在许多具体的案件中，如果本人赔偿管理人遭受的所有损失，反而会给本人带来巨大的负担，因此我们必须通过可预见性和事务固有风险之考量，确定真正需要救济的损害。而对于赔偿额超出本人承受能力的，应当借助于损害额酌减制度，遗憾的是《民法典》并未明确确立上述制度，我们只能借助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对损害赔偿额予以限制。除此之外，如果不是管理事务固有风险下的损害，出于管理行为急迫性的考量，法官也可以基于公平责任原则给予管理人一定补偿，但是该种公平责任的适用需谨慎。

《民法典》第 979 条第 1 款和第 183 条针对管理人和救助人遭受的损害采用适当补偿的规定，已经被立法正式落实。但是即便如此，该种适当补偿不能解释为奥地利法上的公平责任，也不能直接解释为瑞士法上对完全赔偿原则的突破，仍然应当以无因管理之债来展开。就具体的操作而言，应当采用内外部控制的方法予以展开，仍然应当通过事务固有风险、损害额酌减制度和公平责任原则共同协力完成。不过，我国规范性文件针对无因管理，尤其是特殊无因管理，一直有强调根据受益人受益多少和经济状况来确定对管理人损害救济的倾向。上述两种考量因素已经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形成了一定的影响力，就受益人的经济状况之考量，这与损害额酌减制度是一脉相承的。而就受益人受益多少这一因素，虽然直接以此作为限制并不合理，但是纳入考量仍然有其现实价值。尤其在受益人获益的是财产收益时，管理人遭受的损害如果低于受益人获益范围的，应当予以全部救济，如果高于获益范围的，才需要考虑外部控制，因而，至少在受益人获得财产收益的范围内，没有必要引入损害额酌减制度。综合而言，《民法典》对于无因管理制度解释论的展开，仍然应当肯定管理人遭受损害的赔偿权利，至于损害数额较大的控制或者非固有风险下的损害的救济，则通过个案中具体考量的有条件介入来化解。

五、结 语

自《民法通则》时代以来，规范性文件一直区分一般无因管理和特殊无因管理，分别确定管

〔67〕《民法典》实施以后，在对第 979 条第 1 款的理解适用上，较之于《民法通则》时代呈现出更加混乱的态势，有时过错甚至被纳入公平原则之考量，判决前后对过错的认定有时也呈现出矛盾。具体可参见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2021）湘 01 民终 691 号民事判决书。

理人遭受损害的救济,前者架构在无因管理之债上,后者直接以公平责任为根基。该种区分虽然不具有正当性,但是却折射出我国实证法对损害赔偿限制与扩张的两种潜在倾向,限制主要体现在损害额巨大之时,扩张则体现在不是固有风险导致的损害之时。《民法典》虽然对此进行了统一,但却不恰当地使用了适当补偿制度,一定程度上错误地与公平责任建立了联系,反而降低了对管理人的保护,不利于无因管理价值的实现。我国《民法典》未来解释适用时应当对上述规定予以重新检讨,该种适当补偿仍然应当架构在损害赔偿之上,而不是象征性救济的公平责任,解释论上我们依然应当遵循内外部协作控制的方法,恰当地确定管理人的损害救济。

Abstract: Regarding the relief of damages suffered by managers in voluntary service, regulatory documents are constantly changing, and judicial practice is also difficult to deal with it in a unified manner. Possible paths of interpretation including a unitary model that integrates voluntary expenditures and involuntary damages with the help of necessary expenses, and a dual model that distinguishes between the two and regulates them. In our country, the early empirical law inappropriately adopted a hybrid model, which was structured separately for general voluntary service and special one. For the damage suffered by managers, the former applies the principle of damage compensation, while the latter is based on fair liability. Such an approach brings a dislocation in value. In order to reconcile the aforementioned contradictions, the Civil Code unifies the general voluntary service and the special one, but inappropriately adopts the dual model, and structure the relief of damages on the basis of fair liability. Although the necessary expenses and damages are not the same, as long as the reasonable benefits that are highly related to the execution of the affairs are reduced, the law needs to provide relief. As for the control of the high amount of compensation, the internal and external collaboration should be adopted, and the inherent risks of the affairs and the system of reducing the amount of damage should be used to improve it. For the relief of the damage suffered by the rescuer under the emergency rescue act, the compensation standard can be relaxed and fair liability can be introduced to improve it.

Key Words: voluntary service, suffering damage, necessary expenses, fair liability, appropriate compensation

(责任编辑:徐建刚 赵建蕊)